



## 用儒家文化照亮财富创造之路

孔庆林

当今中国,是崇尚财富的年代,没有财富的创造,就没有中国的民富国强。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,我们应该继承其精华部分,和当今的经营活动结合起来,借以照亮财富创造之路。

### 儒家文化能否照亮财富创造之路

提出这个问题,是因为有人对此持否定的观点,认为儒家重义轻利,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一定矛盾,因此,只有抛弃儒学,才能谈得上财富的创造。

认为儒家重义轻利,显然是孔子说的“识其一,不知其二。”(《庄子·天地》)我们不妨从孔子的富民思想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公元前 484 年,孔子结束了 14 年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鲁国。儒家经典记载的鲁哀公向孔子问政的话,都是这个期间发生的。一次哀公问孔子:“什么叫政治?”孔子回答说:“政在使民富且寿。”(《说苑·政理》)这句话,集中体现了孔子的富民思想,甚至可以认为,这是孔子所有言论中最精彩、分量最重的一句。之所以这样认为,是因为这句话回答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执政的根本理念和根本目的,它既是孔子仁者“爱人”(《论语·颜渊》22 章,下只





注篇)这一核心思想的立足点和落脚点,又是孔子“天之所生,地之所养,无人为大”(《礼记·祭义》)思想的具体化。人类社会,尽管社会制度不同,从政的方式、道路不同,但归结于一点,难道不都是以人为本,“使民富且寿”起来吗?

现在中央提出“坚持以人为本,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”,把发展的目光聚焦于民生问题的科学发展观,可以认为是孔子关于“政在使民富且寿”这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。

引用这句话的意思,是想说明孔子对利不仅不反对,相反还非常重视。比如他的学生原思做了地方官,俸米 900 斗,原思认为多了不接受。孔子知道后说:“毋!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!”(《雍也》)意谓不要这样,可以分给你的邻居和乡亲嘛! 该得则得,多余的可以周济街坊邻居中的穷人,不但是孔子仁爱思想的体现,也体现了他多劳多得的观点。

孔子认为,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财力的支持。如他说:“自季孙之赐我千钟,而友益亲;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,而道加行。故道有时而后重,有势而后行。微夫二子之赐,丘之道几于废也。”(《说苑·杂言》)意谓自从季孙氏赐给我千钟粮食,朋友与我更加亲近;自从南宫敬叔送车给我坐,我的主张更加容易推广。所以,主张需要遇上一定的条件才被看重,拥有势位才能实行。若没有他们两位的恩赐,我的主张等于是废弃了。

至于为什么会认为儒家重义轻利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,主要还是由于我们没有深入、全面了解孔子的原本思想,误认为孔子轻利。比如,孔子说过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里仁》),以及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、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(《卫灵公》)等话,再加之《子





罕》篇有“子罕言利”一说,因此,在我们一般印象中,孔子不怎么讲利,好像对“利”存有某种偏见,这就是误解。孔子讲这些话的本意,是希望自己的弟子不可因利而陷入唯利是图的泥潭,特别是在遇到困境时,不因利而丧失自己的斗志。他认为,“放于利而行,多怨”(《里仁》),他培养的是治国安邦的国家栋梁之材,如果眼睛只盯着小利,那就是如他说的“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(《子路》),这就和孔子的意愿背道而驰了。

孔子反对见利忘义,提倡义利合一,做到取舍不苟,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孔子的义利观: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,只要政策对头,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,它不但可以创造财富,而且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,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变化,活跃于海内外一大批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商帮的实践,无不对此给予了验证。

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吴汉泉认为,尽管现在流行哈佛管理热,但是儒学的五伦、五常,还有“和为贵”思想,都是海外华商从两手空空到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石。新一代华商在用MBA管理思想进行交流的同时,应回头找寻中国儒家文化传承的思想财富。



### 儒家文化怎样照亮财富创造之路(一):修内圣做人之德

孔子关于内圣做人之德的思想,甚是丰富博广。比如好学上进、厚德载物、爱家爱国、明礼谦让、仁爱乐善等等。而这些,又集中地体现在孔子说的“修己以敬”(《宪问》)这句话上。梁启超先生在《儒家哲学》中说:“做修己的功夫,做到极处,就是内圣。”





商业是一种求利性活动,经商是为了赚钱,但如何求利,如何处理好己利和他利的关系,大有文章。对商家来说,要明确的一个道理是,利他就是利己。不赚黑心之钱,不发不义之财,力求从德行、思想和财富的创造上影响他人,这就是人格。有了这样一种大视角、大境界、大智慧的大商业观,才能成就大事业。

传媒大王默多克在评价李嘉诚时这样说:“李嘉诚相信天下最聪明的生意是——做人重于经商。换言之,要经商必先做人。的确,小商人做生意总是两眼直盯着钱,心中有种种感人的‘小算盘’,这种小‘摊贩’似的经商方式,是绝对不可能做大的;大商人则心明眼亮,把做人的利害关系摆在第一位,他们懂得善于做人,可以给自己的经商带来无形的资产,赢得大笔的财富。前后两种人,做人态度、经商方式不同,境界自有高下。李嘉诚则属于做人到位,经商得法的一代‘华人首富’——在他的人生簿和生意簿上处处闪现着做一等人的智慧,做一流生意的法则。”

要知道,人格的魅力,是长期起作用的无形资产。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大国,人们对人格的认同和成事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其实,文明程度越高的民族,人们对人格认同的要求也就越高。

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日本松下电器商学院,明确地提出“经商之道在于德”的思想。课程安排,主要是儒家的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等内容。

法制与道德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两个支点,缺一不可。现代市场经济,既是法制经济,又是道德经济。如同鸟之两翼,只有两者互为补充,才能高飞远航。





将道德与经商活动融为一体,以德聚财,以财播德,做人第一,经商第二,靠人格取胜,这是儒家的价值导向,也是用儒家文化照亮财富创造之路的正确选择。

### 儒家文化怎样照亮财富创造之路(二):成外王成事之道

儒家的“内圣”要求,即儒家的心学并非目的本身,而“外王”,即经世致用的本事,才更具有实际意义。由此想到,用内圣的德这个“形而上”之道去统御外王日用技艺的“形而下”之器,也就成了儒家外王成事之道的必然选择。

孔子思想的一大特色,就是以“成人”为目标,以“成事”为目的。在他看来,成人是手段,成事是目的。他曾深刻地指出:“诵诗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,虽多,亦奚以为?”(《子路》)意谓熟读诗经三百篇,让他搞政治,不会;走出国门办外交,不能独立应对。像这样读得虽多,又有什么用?这段话,集中体现了孔子学以致用的思想,外王成事的价值指向十分清楚。

孔子一生,主要是教书和整理六经典籍两件大事,从政的时间不是很长。但他珍惜从政机会,努力工作,由下层到中层,再到高层,经历和处理了诸多问题,也积累了许多治政治国的经验,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,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思想家和管理的实践者。

宋朝宰相赵普有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说,所谓治,就是管理。孔子的管理思想,虽然主要讲的是社会道理方面的,但其道理,也可借用到企业管理和财富创造之中来。如同冯友兰先生在讲到儒学与工商社会的关系所指出的那样:儒家伦理虽然产生于农耕社会,





但所阐述的并不限于农耕社会之理,而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。

以孔子的贵人思想为例:《乡党》篇记载了一个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。这件事发生在孔子为鲁司寇时,孔子正在朝中处理公务。一次国厩(马棚)失火,孔子得知后马上退朝,赶赴现场。他首先想到是否有人伤亡,问“伤人乎?”而未虑及马匹损失。要知道,当时人贱马贵,“5名奴隶=1匹马+1束丝”。孔子发现马厩失火,第一句话问人不问马,连同孔子其他关于重视生命价值的思想,让人深切地感到,孔子对人之生命的无限热爱与珍惜。

在财富创造的活动中,把孔子的贵人思想,贯穿于经商活动或企业管理的全过程,对于事业的成败,有着决定性的意义。财富的创造,离不开和人打交道;管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最高境界,一定是着眼于人的。

再以财富的创造为例,孔子说: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。”(《泰伯》)意谓国家有道,自己贫贱,是耻辱。孔子的思想,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其亮点之一,就是他的富民思想,这段话,体现了这一思想。在太平盛世,如果不是特殊原因,仍然贫穷,这难道不是让人感到耻辱的事情吗?因此,在太平盛世,要把挣钱看作是一种责任,向贫穷宣战。

用儒家文化照亮财富创造之路,不是说具体如何发财致富,而是告诉我们做人的原则,成事的智慧。公元前484年的春天,孔子的学生冉有为季氏统帅军队,和齐国作战,打了大胜仗,季康子问冉有:先生的军事才能,是从那里学来的?冉有说:“学之于孔子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子贡是被后人称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“家累千金”(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的大儒商,和范蠡齐名。旧时商家大





门贴的“陶朱事业,端木生涯”,即是指有商人鼻祖之称的范蠡和孔门儒商第一人的子贡。孔子教给冉有军事知识吗?没有,连孔子自己都说,“甲兵之事,未之闻也”(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);教给子贡怎么发财吗?没有。冉有能够打胜仗,子贡能够发大财,就在于他们掌握了孔子关于做人的原则,成事的智慧。

孔子说过“君子贞而不谅”(《卫灵公》)的话,意谓君子固守正道,不应无原则地守信用。这就告诉我们,君子只能和君子讲信用,否则,就极易上当受骗。还说过“小事之成,不若大事之废”(《晏子春秋·谏下》)的话,等等,这都是一种成事的智慧。孔子说:“我战则克。”(《礼记·礼器》)这句话,充分展示了孔子“不飞则已,一飞冲天;一鸣则已,一鸣惊人”的志在必得的高度自信心。创造财富,需要这种精神。

孔子的全部学说,可以归结为如何做人和成事两个方面。内圣做人之道做得越好,外王成事的本事越大,两者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,这才是儒家理想的士人形象。

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,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,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,可以归于三类:一类是他创造的剩余价值自我收支平衡的人,一类是他创造的剩余价值收不抵支的人,一类是他创造的剩余价值收大于支的人。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社会,靠的就是第三类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断地堆积而发展起来的。如果收不抵支,或者收支平衡,那就不会有人类的发展。今天的中国社会,需要的是第三类人,这样的财富英雄越多,社会的发展就越快。

今天,在太平盛世要创造财富,成就事业,必须回到孔子那里,





去汲取他做人成事之道的智慧。用《红楼梦》第五回里一句话说,就是“留意于孔孟之间,委身于经济之道。”昔日的儒家思想,就是今天的财富创造之源。

(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)



孔庆林,1945年6月生,山东曲阜人。1956年参军,1974年转业至胜利油田,1975年调至中石化管道储运公司,毕业于北京石油干部管理学院。2005年退休后,热心于儒家文化的学习与传播,现任徐州市孔子学会副会长、中华孔子学会会员、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、香港孔教学院会员、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副秘书长、国际儒商联合会学术顾问。

